



丛子明 徐英杰 著

天尽头的大潮

海 洋 出 版 社

写在前面的话

改革开放10多年来，我国渔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七五”计划中，原定到1990年水产品产量达到900万吨的目标在1987年就超额完成了。1988年全国水产品的产量突破了1000万吨大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产量超千万吨的国家。1989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民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国际市场的波动，渔业生产一度遇到了市场疲软、银根紧缩、物资短缺、税费上升、成本上涨等一系列困难。但是由于各地采取积极措施，改善管理，调整生产结构和品种结构，千方百计增产，降低成本，稳定效益，疏通流通，使渔业生产在困难中持续发展，防止了“滑坡”。1990年水产品产量达到1237万吨，比上年增产85万吨，是我国大农业诸行业中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

10年来，我国的水产行业有什么经验？今后的路子应当怎样走？为了探索这些问题，作为水产战线上的调研人员，不能不下到渔村进行调查研究。但是，当我们来到山东省荣成市的渔村调查之后，却被这里10年的发展速度惊呆了。1989年荣成市水产品总产量达到了43万吨，渔业总收入达到了14亿元，分别比“六五”末的1985年增长80.7%和430.8%。1990年虽然老天爷翻了脸，赐予他们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风浪灾害，许多渔船被毁，海上养殖几乎“一风吹”，许多陆上保障设施被损坏。但产量仍和去年持平，总收入达到16.7亿元。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全国都是一

个政策，为什么山东荣成水产业的发展速度会这么快呢？

山东荣成的变化与发展使我们感到惊讶，激动，振奋，也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把所见所闻的东西写成了“情况反映”、“工作报告”、“调查研究”等反映给有关部门。在写完了这些“反映”、“报告”、“调查”之后，我们总感到不满足，有言犹未尽意也无穷之感。一项项枯燥的统计数字，一条条“干巴巴”的经验，固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这些材料只能作为有关部门的决策依据，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特别是不能让水产行业以外的人们了解。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鱼，在人们膳食中占有了一定的位置。古语云“无鱼不成席”。鱼成了今天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而前几年，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边远山区，到处都在呼喊“吃鱼难”，然而，才几年时间，吃鱼难的声音，渐渐地听不到了。人们的吃鱼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近5年，渔业生产的发展，使我国水产品供给总量大幅度增加，人均占有量10年提高了6公斤多。据对全国46个大中城市测算1989年人均占有水产品接近19公斤，比1985年提高了约7公斤。如今，连过去一些祖祖辈辈吃不到鱼只在逢年过节时，不得不用木头雕刻的鱼或用面捏制成的面鱼来祭祠的地方，如今也吃上活鲜鲜的鱼了。怎样让更多的人了解渔业，支持我国的水产业？用抽象的语言和数字，也能说明问题，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介绍他们的事迹和经验、不是效果更好吗？于是，我们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再者，就目前书籍的出版状况而言，专门用以描写渔民的作品并不多，即是有一些，也是一鳞半爪，用“大海捞针”来形容，也不过分。今天渔村富起来了，渔民也希望看到更多的反映他们

真实生活的作品。尽管我们不是专门作家，在每篇文章的构思上，谈不上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熟练的写作技巧，但我们相信，事实是最能教育人的，事实也最有说服力。那么，把他们的事迹原原本本地勾画出来，让人们自己去想象、去判断，不是也很好吗？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那怕能给我们的专业作家和诗人提供一些原始素材，让他们在深入渔村之后，创造反映我国渔民生活的优秀艺术品也好。于是，我们选择了记实性的报告文学的形式。这里面有的人和事也曾散见于报刊。我本人过去就在报刊上介绍过这本集子中的人物的事迹和经验，如今，他们的工作和经验在新的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用新眼光去认识他们。并将他们的经验放在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渔业，路该怎么走的大背景下去思考问题，探索我们的未来，于是，就形成了这个集子。

那么，荣成的经验给人们些什么启迪呢？

一、在当今我国近海渔业资源不断下降情况下，沿海渔村的渔业应怎样发展？荣成在《市委书记的兴渔战略》里已清楚地告诉人们：“最根本的出路就是要确立和实施以养兴渔的战略。”他大声疾呼：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变革的时机已经到来，甚至迫在眉睫。这是因为，近海捕捞资源日趋衰退，外海捕捞一时又不能大规模打出去，不少主捕鱼种有的已形不成渔汛，有的业已绝迹，旺季“清海”现象已屡见不鲜，捕捞生产每况愈下。据统计，近年来，全市平均马力产量由1980年的1.4吨，下降到0.9吨；优质鱼比例由1980年的40%，下降到10%左右，大海已向人们亮出了“黄牌”。与此同时，油源缺、油价高、鱼价

回落，捕捞比较效益下降；有关部门严格限制增船增马力，因此靠捕捞的外延扩张发展生产已很困难。这说明，渔业的发展到了转折关头，实施“以养兴渔”战略已刻不容缓。历史的经验业已证明，养殖也的确能够兴渔。荣成市70年代海带养殖的突破、80年代扇贝、对虾养殖的突破，仅这3个品种就增产15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35%。实现了“以养兴渔”，就可把我们渔业从“竭泽而渔”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进入资源再生的良性发展轨道。他还告诉人们：实现“以养兴渔”的条件也是具备的，全市500多公里的海岸线，是鱼虾贝藻的理想繁衍地，20米等深线内的可养海面达200多万亩，可增殖的海底又是200多万亩，而现在200万亩海面仅利用了二分之一，而200万亩海底基本上还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如果把这些海面和海底全部开发利用起来，渔业的增产增收潜力可谓不可估量，为国家和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又可谓源源无穷。为此，要一手抓养殖，一手抓增殖，要先易后难，各个击破，逐步把海参、扇贝、牡蛎、鲍鱼、魁蚶、毛蚶、海胆、蟹类等生长周期短、定居性高、出口创汇率高的品种先增殖起来，使全市广阔的海涂真正变成“贝类仓”“活鱼库”。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过去那种在“拉郎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自然解体，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渔村，也打破了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僵化模式，实行了“几定奖赔”、“比例分成”、“大包干”和“以船核算”等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据统计，至1988年全国渔村实行“以船核算”的

海洋集体渔船占81%，实行“大包干”和“比例分成”的，分别占12.7%和5.3%；个体渔船和私营渔船发展到了几万艘之多。真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之趋势。

在此期间，沿海一些渔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渔业经济有一定规模的渔村怎么办？是不是也要“分船到户”和实行“以船核算”？荣成的渔村干部和群众想到的却是，党的政策从来就是实事求是。我国海岸线这么长，各地的情况不同，不能“一刀切”！他们不盲目随大流，而是根据本地区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坚持船网工具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完善几定奖赔责任制的具体内容和改善经营管理上。他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吸收了各地各种责任制的长处，结合自己的实际，取长补短，制订了“统一经营、分级承包、计划内外纯益按不同比例分成”的承包经营管理办法：统一经营，就是由集体统一下达生产计划，统一供应渔需物资、统一销售渔货、统一船具修造、统一制定重大生产措施和统一确定分配方案；分级承包，就是将计划包到各行各业，各行业再根据实际情况分包到最小独立生产单位，纯益按不同比例分成，就是承包单位年终分配以其实际创造的纯益为依据，水涨船高进行分配。为了鼓励多创纯益，对纯益超计划的部分，分成比例一般掌握承包者多得，集体少得的原则。这种企业化的承包管理办法，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打破了两种“大锅饭”（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小集体吃大集体“大锅饭”）。荣成人自己称这种经营管理方法为“荣成模式”。的确，在我们所走到的渔村，不论是大鱼岛、靖海、邱家、朱口、龙须岛、蒲家泊、马山等，凡是实行这一种经营管理办法的，都是产

量成倍增，效益十倍长。

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进行分配一直是困扰人们思想的一个问题。在荣成的渔村，我们听到人们爱说的一句口头禅：“分光吃光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在每年的渔业丰收之后，总是首先留足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这主要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和兴办集体福利事业。有的渔村积累40%，有的渔村是50%，有的甚至积累达到60%。这在外面人看来，也许觉得高了些。但是，当遇到大灾之年，就显示出了它的威力。因为，这是他们根据海上生产特点决定的。这也是他们从多年来海上生产的血的教训中悟出来的。1990年5月1日，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荣成沿海又遇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浩劫。光是靖海渔业公司直接、间接的损失就达2600多万元。但是，当上级来人了解他们受灾情况，问他们需要国家补助多少物资和钱财才能恢复生产的时候，靖海渔业公司的经理许敬三却真诚地说：“目前国家财政不富裕，眼下遭灾的地方又多，我们不要国家补助一分钱和物资，靠着几年来的公共积累完全可以恢复生产。”他把平时积存在仓库里的2000扣坛子网拿出来发给各船队，只用一个星期就恢复了生产。

虽然他们积累的比例看来好象是高的，但是就是按照扣除的公共积累剩下的这40%、50%、60%，来分配，每个渔民的实际收入也是一些靠拿国家固定工资吃饭的职工望尘莫及。有的渔业劳力一年拿二、三千元，有的拿四、五千元，最高的上万元。

四、当前，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有没有优越性？或者说怎样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

性？对于这个问题，荣成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当我们在荣成一些渔村调查时，不时遇到不少外地沿海渔村来这里参观“取经”的人，他们异口同声赞道：“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渔业的路子。”用这句话去评价荣成的渔村是不是过分，我们暂不去评说，但是荣成渔村集体生产发展了，这是所有来此参观者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荣成渔村，渔村企业舍得拿出钱来为渔民办实事，为整日在海上辛劳打鱼的渔民们解除后顾之忧。不论是从铁槎山下朱口渔村一幢幢参差错落的别墅式的小楼，到邱家渔业公司那集中连片的“渔民乐园”，还是蒲家泊的“海市蜃楼”，都让城里来参观的人流连忘返，人们纷纷发出“如今我们国家副总理一级住房大概也不过如此”的感叹。另外，荣成渔村都普遍办起了“儿童乐园”、渔村小学，他们对考上大学的渔家子弟给以较高的补助，对上了年纪的渔民实行了比国营职工还优越的退休制度，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群众渔业企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最后，还有一点最使我们感动的，还是荣成渔民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吃大苦、耐大劳的实干精神。这里人有句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而10年前，这里的渔村仍然在贫穷的旋涡里打转转。今天渔村普遍建起了渔港、码头、冷库、加工厂、育苗场、养虾厂等，这些新变化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硬是凭着当地人的双手，拼力奋战，短短几年建起的。不论从邱家渔船劈山填海的新“神话”，“精卫填海”的传人的背石建港，还是天尽头人的潜水建港，都为人们难以想象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我们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没有现实意义？

当然，“荣成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他们自己也常对前来

参观者们说，这是本地渔村干部、群众摸索出来的办法，有的是成功了，有的则不成功，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荣成人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渔业的路子和经验，可能有他们的特殊性，也不一定完全适合其他的地区。然而，荣成的经验也有其普遍的意义。中国有句老话，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我们相信一定有许许多多的新“八仙”在我国的渔村中涌现。我们把荣成的管理经验呈献给读者和水产业的同行们，希望创造更大的成绩，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渔村更加欣欣向荣。

目 录

市委书记的兴渔战略	(1)
关于天尽头的传说	(13)
崛起的青鱼滩	(24)
大鱼岛的情怀	(35)
石岛人	(60)
靖海人的理想与追求	(70)
邱家渔村的腾飞	(105)
在萧条中奋起	(151)
他在海上耕耘	(166)
铁槎山下创业人	(188)
滨海花最美	(204)
蒲家泊的“海市蜃楼”	(214)
白天鹅落脚的地方	(221)
多姿多彩的海湾	(229)
胶东有个黄海造船厂	(241)
后记	(272)

市委书记的兴渔战略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但，怎样吃海，可大有学问。

在山东省胶东半岛地图的“骆驼头”尖上的荣成市，是全国著名的渔业县市之一，渔业对这个拥有70多万人的滨海县市人民的生活富裕与否，起着重要的作用。

荣成有500多公里的海岸线，水产资源丰富，发展渔业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渔业生产一直沿袭单一捕捞的传统落后方式，发展缓慢。到1945年，全县只有大小木帆船1553只，各种网具24187扣，从事渔业生产的劳力6124人，年产量仅1.3万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渔业生产虽然有所发展，但步子不够快，到1978年，全县共有2.3万人从事渔业生产，有各种机动渔船2000只，共8万匹马力，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3万吨。但改革开放以后的8年，荣成水产品总产量由13万吨，一下子提高到43万吨。渔业总收入从9000万元，猛增加到14亿元。固定资产总值从1.5亿元，增加到7亿元。渔业劳力从2.3万人，增加到6万人。目前，渔业总收入已占荣成市农村经济总收入的50%。经有关部门考核，荣成在水产品产量、渔业收入、海带养殖面积、扇贝养殖面积、大马力渔船的拥有量、集体渔港处数、冷藏加工能力、育苗水体、群众集体渔业的规模、集体积累等10项指标

均名列全国县级市之首。

如今，荣成的渔村富了，那么，作为县市一级领导，这几年来是怎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抓渔致富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到荣成之前，或深入渔村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脑际中。我们在渔村采访时，不少渔民向我们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他叫张执政。看来，想了解荣成水产业的发展情况，不找张执政不行。那么，“张执政是何许人也？”我们带着疑惑问荣成人。

渔民们亲切地告诉我们：“他就是现在荣成执政的市委书记，俺们的一把手。”人们还告诉说：“他原先是县里分管渔业的副县长。他抓起渔来，可真有一手。这几年，俺这里有多大风，他那里就起多大浪。我们没咒念时，就去找他。他准能帮俺出点子。这几年，他操的心比俺们还多。你们要写荣成的渔业，不写上他一笔可不中！”

“还是和渔民商议商议再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包到各家各户，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但是，作为从事海上生产的渔民怎么办？是不是把船也分到户？这时，有的沿海地区也实行了“船网作价下放”的生产责任制，于是有的人建议，县委是不是也推广“分船到户”的作法。县委一班人深知，这是重大生产体制的变革，不能草率行事。党的政策从来是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国海岸线这么长，各地情况不同，生产方式不同，人们的劳动习惯，文化观念等都不一样，哪能“一刀切”！这时候，作为分管

渔业的副县长张执政同志，不能不更多地思考这个问题。

说起打鱼来，张执政可不含糊。他10多岁就上船打鱼、摇橹、使舵、下网、起鱼，海上的活他样样在行。他谙熟荣成这一带海域的情况，连哪个港，哪个湾有几块什么样的礁石都能说上来；他熟悉哪个渔场什么时候出什么鱼，如数自己家里养活的小鸡。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干部，合作化时，组织上把他从渔船上调下来，让他当了渔业助理员；不久又当上了镇委书记兼捕捞公司书记。他就是这样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了县里分管渔业的副县长、县长、市委书记的岗位。

他，个头不高，中等身材，圆圆的脸盘儿，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头脑灵活，思维敏捷，平日说话慢条斯理，不紧不慢，有时还合辙押韵，象作诗一般。他的这种说话习惯是叫人记得住。

今天，渔业上究竟实行那一种责任制好，虽然他心里有谱，但按照他往常的工作作风，还是要和渔民商议商议再说。

这一天是星期日，黎明的旷野，一片皑皑白雪。海边的小北风呼呼地刮着，他蹬着自行车直奔海边渔村。今天他要来个“微服私访”。

他来到一家渔民的门前，把车子往旁边一支，就走了进去。也巧，这户渔民正是当年和他在一条船上打过鱼的船长。

“哎呀！老张，什么风把你刮来啦？”

“怎么，就不兴我到你家串个门？”

船长一边说一边拿起了一支“过滤咀”。如今，这一带渔民抽“过滤咀”已经不足为奇了。

张执政不抽烟，端起一碗水，两个人就聊了起来。他先询问了这一季海上的渔情，又问他今年能分多少钱？对方竖起两个指头，说：“多了咱不敢吹，今年这个数在俺队里我是稳拿了。”接着，张执政就问他：“如果把船分给你自己使，队上不再管你，你看这么个干法，挣的是不是还要多些？”

谁知，这个船长一听就火了。“你这不是在开玩笑，你也是打渔出身，还不明白这个理？俗话说‘打鱼放船，等于闹玄’那玩艺儿，一条船，几十万，说不定那天一阵风就给你刮跑了，把船分给个人能行吗？”

张执政也笑了：“眼下别处不是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做法了吗？……我这是和你随便扯扯的。”

张执政串了这家又串那家。荣成有渔队的地方他几乎都跑了个遍，听到的几乎都是这个声音。他的心里有底了。回到县里，他向县委报告了他调查的情况，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别处搞分船到户”，那是人家那里有人家那里的情况。在咱们荣成，特别是一些已经形成相当的生产规模的生产队，假如把渔船分了，渔业的生产能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所以，咱们荣成的渔船不能分。

渔船不能分这个原则就这样定下来了，但是眼下生产中“吃大锅饭”的做法不改不行，但是怎么改进呢？

这一天，他来到邱家渔业公司，见唐厚运搞了个“五统一下的分级承包，利润按比例分成”的办法很受启发，就是在公司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供应渔需物资、统一销售渔货、统一按排船网工具维修的基础上，下层各单位向公司承包一定的利润指标，完成后按比例分成。多超就多分，这

样做好处是，既避免了原来的“大锅饭”，又调动了渔民多劳多得的生产积极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看，效果很好。原来渔船收港回来，七、八天也出不去海，现在回来卸下渔货就马上出海了。在海上拉鱼的产量比过去提高了。

张执政听了唐厚运的汇报，一拍桌子，说：“好，你这个办法中。我给它起个名子叫作：“大包干、一溜烟，不抹桌子（荣成地方话，意思是不能说了不算），不拐弯。唐厚运也高兴地说：“你归纳的好，又上口，又好记。”

这样，县委根据渔业一次性投资大，危险性大，丰歉性大，协作性强的特点，既没有照搬农村“分户经营”的模式，也没有照搬别处渔船“折价下放”的办法，而是从“三强一大”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本地渔业体制的改革。各渔业公司和渔队普遍建立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分级承包，纯益按计划内不同比例分成的新的生产责任制。”这种管理办法既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引入了承包机制，打破了各生产单位内部的“大锅饭”，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又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在渔业上得到有机的结合。

这种责任制推广几年，各渔业队发展很快。有的收入几年从几十万元猛增到几千万元。渔业收入增多了，分配问题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同样要挫伤渔民的生产积极性。

有的说：“多挣多分，要不然留下那么多钱干啥？”

张执政提醒大家：多挣多分的按劳分配原则没错，但是分光吃光的做法可不是社会主义。要考虑集体经济的积累扩

大再生产，还要照顾到和农民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又到农村去调查了农民的分配情况。经过比较分析，他看到，目前渔民分配的不少了，一般渔民年收入四、五千元，而一个农民年收入仅七、八百元。渔农劳动分配最高的相差近十倍；渔农收入差别过大，既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市委认为：一个渔民的收入不应超过3个农民的收入。渔民手中多下的钱怎么办？发动大家入股，钱入股了，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生产发展了，第二年人们又可多分配。他在全县干部动员大会上，讲起了政治经济学。为了具体说明渔民的实际收入情况，他特意把全县积累和分配处理较好的邱家和靖海渔队的队长唐厚运和许敬三请到台上，让他俩现身说法，算帐给大家听。生动具体的报告，告诉与会者：当前渔民的收入已经够多的，再多分了干什么？一个是盖房子，再多了就有可能搞歪门邪道了。他们的话说得大家口服心服。

张执政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分留比例，建立了“一教育（教育渔民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二限制（全县统一确定分留比例，限制过高分配），三缩短（缩短船网工具折旧年限），四提留（在总额分配中提出风险金和劳保金），五扩大（扩大渔民入股比例）”等一套较为完整的制约政策和管理体制，从而比较全面地兼顾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扩大了集体积累，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平，避免了悬殊过大，促进了社会安定。几年来，全市渔业纯收入的比例都在50%以上，年积累达到3亿元左右，使荣成的渔业走上了靠自我积累发展的路子，形成了积累—生产—再积

累—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使全市渔业不断前进。

构造大渔业的框架

从事渔业生产风险性较大，往往要看老天爷的眼色，偏偏荣成又是一个多灾的地方。这一年，一场强台风又袭击了荣成沿海。全县渔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灾害。有些从事养殖的队，连养殖架子都被风卷走，恢复生产就成了问题。

张执政走在海边上，思考着一个问题：过去渔业上捕则单捕，养则单养的单一方式，互补性差，往往是一业遭灾，整个企业难于靠自身的力量重新爬起来，这几乎成为妨碍渔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此，在全市第一步改革之后，第二步该怎么走？

他又来到了靖海渔业公司找到许敬三：“老三哪，别队都遭灾了，要求政府支援，有的要物资，有的要钱，你看你们需要政府支援点啥？”

谁知，许敬三爽快地回答：“我们这里不需要政府的支援，请政府把有限的物资和财力支援比我们困难大的队吧！”张执政愣了，又问他说：“你这不是有情绪吧？咱们可是要当面说实话，鼓对鼓，锣对锣，不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许敬三告诉他：“我这是说的真心话，因为我这里摊子大，捕捞、养殖样样都有；另外，我还和外商建立了补偿贸易，所以遇到这里受点灾，我们能自己爬起来。”

许敬三的一番话，说中了张执政的心思。他向市委和政府建议，这第二步改革，全市的渔业生产应由传统单一生产方式，转向养殖、捕捞、加工、副业综合发展的经营方式。由单纯